

世纪沉思

沈逢吉 著



世纪沉思

CENTURY MEDITATIONS

Upon Fundamentalism

沈逢吉 著



作者，2016



作者及妻胡家宸，2016

目 录

萍踪忆拾 / 1

岁暮盘点 / 54

劳动·价值·逻辑思考 / 72

南开教育的民主精神：话题 / 77

我看历史发展规律 / 89

再谈历史规律与终极目的 / 95

国家主权淡化？ / 106

民主和平论？ / 112

阶级分析新论 / 122

历史中的经济转轨 / 140

历史主义贫困？ / 147

人文精神偶感 /	165
捏面团·多元化·及其他 /	182
两种高考和指挥棒 /	199
宗教和类宗教 /	212
旅美散记二则 /	220
一党治国与政治改革 /	230
“民主社会主义模式”读后 /	239
最初的心灵感应 /	243
现代政党琐语 /	245
当代史片断遐想 /	249

萍踪忆拾

人云老年人喜欢忆旧，信然。如今已步入老年，闲适无事，常追思生平。这一辈子看似平淡，然而由于世局颠腾，却有着不少不寻常的遭遇。照如今年轻人看来，简直是难以想象。这就是历史的印迹啊。

1946年夏，我从重庆南开中学高中毕业（理科），随家庭乘船东下，到达南京。我父亲当时是中央大学（即后来的南京大学）外文系教授，一家子被安顿在文昌桥家属宿舍里，离鸡鸣寺不远，我记忆中只有一间大的房间，可以望见窗外远处开行着南京特有的小火车。父母亲加我和三个妹妹一个弟弟，（到49年又添一个小妹妹），局促可想而知。

到南京不久我即投入紧张的高考。为了增大录取机会，也为了多尝尝名校入学考试的滋味，我先后在上海、南京两地报考清华、北大、上海交大和中央大学四所高校，志愿统统是电机系。天大热，四场高考下来，疲惫不堪。结果如愿以偿，我同时被这四所大学的电机系录取。我选择了上海交通大学，一则它的电机系是齐名的，二则时局已经动荡，一旦内战扩大，恐北方首先受影响。再说，上海离家也近一些。

交大岁月

这一年 10 月初到上海交大报到入学，头一件新鲜事就是这里所有的课程教材统统是英文的，是美国大学的教科书（交大不设“大学英语”课）。原来上海交大的院系（至少工学院、理学院是如此），它的学制、课程、教材和教学运作是全盘照搬美国麻省理工学院（MIT）的，可谓中国移植的 MIT，真是全盘西化。书本全由龙门书局影印，书价不算贵（可见盗版早已有之）。教师全用英语讲（大都是留洋过的），省得翻来翻去，倒也干脆。学生做笔记、习题、实验报告、考试等等全用英文。记得只有教一年级微积分的莫叶先生不用美国教材，用他自编的教材，也是英文的。四年下来，竟没有读过一本中文写的教科书。

教基础课的全都是教授、系主任、甚至是院长，这点最令人满意了。他们用英语讲都很熟练，偶而有的发音不准，如教普通物理热力学的沈德滋教授，总把 available 说成 avialble，怪怪的，不过终是瑕不掩瑜。

这样的教育正合我的心意！因为我的志向是搞科技研究工作，美国的 MIT 是我心中的向往，原指望大学毕业后去那里留学深造的，现在正好接轨。

我的人生哲学中有一条，也不知最初是从哪里来的，可能是时局动荡战乱频仍造成的心理吧，那就是如同一首诗里说的：

Gather ye rose-buds while ye may,

Old Time is still a-flying:

And this same flower that smiles to-day,

To-morrow will be dying.

.....

用中文来表述,大致就是“好花堪折直须折,莫待无花空折枝”。抓住“当前”,珍惜时机,最为重要。

所以,在这样的环境里求学、求知,我把它放在第一位。多少年后回忆,果然,我一生中的黄金时代只有二段:南开中学时期和上海交大时期。

同班的一位好朋友是 Z 君,业务上学习上志同道合,互相切磋,最为亲密。他本是我南开的同班同学,学习很好,现在又在交大同系同班。自三年级起,电机系分为电力组和电信组,我俩同为电信组。每次上课二人必坐在一起,随时可小声提示,保持思路畅达,实验课我二人为一组,配合默契。他家在上海,每天骑自行车来上学。另外一个共同爱好是二人都喜欢西洋古典音乐。我常到他家去,或评点功课,或倾听他家落地收音机中的音乐节目。如此四年下来,到毕业时,全班 44 个人,毕业成绩他名列第二,我是第三。50 年毕业分手,他先是留校当助教,后来交大分了一半迁西安,他也去了。后来听说他去了香港。再后来去了美国。我俩竟未能再见一面(只有少量通信和电话)。

交大的学习生活,另一特点是自由。学习全靠自主,学分制,课可以来听,也可以不听。老师从不点名,从不改作业。不过考试是严格的,有时很难。整体来说,课业

很重,要求相当高,能学到什么程度,就看自己努力了。除了课业,生活上更是完全自由,没有人管。恐怕这就是西方大学的典型做法吧。

如果不提外界的动荡和影响,交大四年的生活确是自由、充实、美好的。其间很自然地我和另外二位同学结有亲密的友谊。一位是 M 君,他不是电机系的,是机械系,专业是铁道机车。因是南开同班同学,在重庆时就很亲近,进入交大后,我同他始终共一间宿舍。另一位同房间的挚友是 S 君,苏北人,敦厚朴实,是同系的同学。我同这二位成为世交,友情久长。不久,M 君和 D 君家庭有亲戚关系,而 D 君和我同系同班,他家在上海,于是 M 君常带我去 D 君家玩,这样我同 D 君也就亲近起来。

到了一年级下学期,遇到一个严峻的问题。我们这一届考入交大的新生,被称为“建训班”(即建设人才培训班之意),又是国立大学,学费全免,伙食和住宿也全部免费,本是够优待的了。不料,由于时局不稳,社会动荡,物价飞涨,学生的伙食越来越差,甚至到了一天的菜金只相当于一根半油条的地步。功课又重,营养不良,眼看同宿舍的造船系某君面颊潮红,轻轻咳嗽,还勉力赶做他的材料力学习题,天天熬夜,想想实在是危机降临!本来我的生活费用由家里汇来,(买书、学习杂费、衣物、伙食补充等),父亲负担一家生活和弟妹上学,(母亲无工作,操劳家务),奔波于另外一处学校兼课,“教授教授,越叫越瘦”,渐渐感到力不从心。这样我得另想办法。有一次回家,晚上在床上换内衣,妈妈看见我裸露的上身,尽是瘦

排骨，伤心地流下了眼泪，说道：“唉，逢吉，都是你偏要去读交大，看你成个什么样子，……。”我安慰她，说不用担心，我自有办法挺过去。

当时交大许多同学出身贫寒，外出勤工俭学（现在叫打工）以维持学业的很多。最常见的是做家教，交大是上海的名校，学生到社会上做家庭教师很受欢迎。D君有个姐姐，是圣约翰大学的学生，因家在上海，路子很广，她给我介绍了一家，让我去做家教。（当时M君和S君都找到了家教的工作）。

这一家姓Su，做棉花生意的，家是一座弄堂洋房，三层楼，上海那种典型的。离交大步行只须10分钟，我每周去一次，星期四下午四点钟到，大约教到六点半，花这点时间对我影响很小。这位Su先生和他的太太和霭可亲，大概是D君的姐姐对他们说专门找了一位交大的高材生来，对我很是欢迎。每月他们付我几枚“袁大头”，这是抵销法币贬值的有效办法，我随时可以在马路边兑换法币，这点报酬足以解决我全部的生活费用（还有多余）。这样我不用发愁了，也从此不再向家里要钱。问题一下解决了，心里很高兴。

更好的是我教的这几个学生。他家共有四个孩子，大的是二男（一个初中，一个小学五年级），小的二女（分别为小学三、二年级）。给我的任务是教这二个女孩，兼管一下那小学男孩。这是我所见过的小女孩中长得最漂亮的，又聪明活泼，很可爱。她们很乐意跟我学，不久，成绩就明显上升，并同我亲昵起来。每次我去，她们总是跳

跃着过来牵手，一边一个，把我拥进客厅。大人很是满意。从此把每次留我吃晚饭变成丰盛的宴请，他们一家六口，加我一个，围一个圆桌，正合我意，大嚼一顿，又不失仪态（那时我总是穿西装）。看来我这个翩翩学子完全为他们所接受，融入家庭。而我也把每周一次去教课看作很愉悦的事，一点也不感到是负担。这样的关系竟然一直持续下去，从未间断，足有二年半（假期不去），直到我离开交大。而且，在 49 年上海解放前一个月，他们请我住到他家里，朝夕相处（因国民党强迫把交大驱散，驻扎军队）。我相信，这一段家教对二个女孩的成长会有大的促进，她们会记得我的。只是不知她们后来的日子怎样？

生活里最大的问题是伙食，这可是“民以食为天”的头等大事。有点钱，就好办了。除了校内外有各种吃食店随时可以加油以外，街上大量的“ration”解决了大问题。原来，二战中美军的军用口粮储备很多，仗打完了，这些储备没用了，都给了中国，上海（例如徐家汇等地）满街地摊到处有得卖，价钱便宜。因是军用品，实际是很考究的，完全用蜡封装的硬纸盒，分早餐、中餐、晚餐，里面按美国大兵营养所需给配好的。譬如早餐就有奶酪、咖啡、压缩饼干、罐头火腿肉等，花色品种多样，打开常会发现新的好吃的东西，宿舍里引起欢笑声。质量上佳，又不变质，实在对我们清贫大学生是再适合不过了。享受 ration 足维持二年之久。此外还有大桶的军用奶粉、冰淇淋粉等等，都是廉价的。

常随 M 君到 D 君家里去玩，也是令人愉快的经历。他家看来很好客，常有年轻人来往。其中有一位年轻小提琴手 Y 君（很有才华，其实已经可称得上小提琴家了），还带着他的女朋友来作客。Y 君思想进步，我不知道同 D 家是怎样认识的。Y 君当时已是上海工部局交响乐团的第一小提琴手。M 君也喜欢音乐，他买了一把小提琴，跟 Y 君学，大约有一年工夫。我没有买琴，开始时跟着学了一段，时间很短，就放弃了（因太费时间，又没有场所可练琴）。果然，这位 Y 君在解放后被派往东欧进修，回国后，在北京担任中央乐团的第一小提琴首席。（后来，文革中因对江青有不满言论被打成反革命，坐牢七年。）

D 君的姐姐善交际，活泼开朗，风姿绰约，在我眼中她必定是圣约翰大学的校花。我喜欢她，竟情不自禁地追求她。D 君和 M 君看出来了，只置之一笑，是善意的。后来，我才知道她是地下党员，真不简单。（D 君也是地下党员）。解放后，我听说她嫁了一位老干部。许多年过去了，我从未见过或打听过她。不知她过得是否幸福？她早把我忘掉了，而我心中还保存着这一段美好的记忆。

课余生活也要“好花堪折直须折”！当时流行的时尚是尽情欣赏美国好莱坞电影，（还有英国片子）。上世纪 40 年代正当好莱坞繁荣时期，影片多得不可胜计，其中确有不少好的。上海的电影院很多，分一、二、三流，一流影院票价很贵，只是偶而有新的大片上演时才去光顾。一般都是待影片转到三流（间或二流）影院时抽空去看。把值得看的影片看个遍，在交大的几年工夫中我看的美国

电影竟有二百多部。那时的外国电影都是进口的原版，没有中文或英文字幕，更没有汉语音译，只有一张纸上印着简单的剧情介绍（叫做“本事”）。上海人懂英语的很多，所以观众很多。看电影对我的英语听力也很有帮助。到后来，有一次看 Paul Muni 的《左拉传》，看完走出影院时发现左拉的那一大段激昂慷慨的朗诵《我控诉》竟完全听懂了，真是不小的收获。上海的影院很考究，即使是三流的，有的也极为精致。有一次晚上，独自到一家“杜美影院”，在偏僻幽暗的杜美路上，影院小小的，环境优美。这一场一共只有十来个观众（不知它如何能维持），放的一张不太知名的英国片子《Black Narcissus》（中文译名好像叫“思凡”）。看完大为惊诧它那人性的震撼力，慢慢踱回学校去，脑海中老浮现那些镜头，挥之不去。好莱坞电影的珍品有很高的艺术性，一批璀璨的明星，天生质丽，演技超群，依我看，直到如今无人能出其右。

课余生活中再一个热衷的项目便是欣赏音乐。西洋古典音乐对我有很大吸引力，上海有个“工部局交响乐团”，隔个把月在兰心剧院举行一场音乐会，我是常客。交响乐团是小型的，水平大概是当时中国最好的，指挥是一位意大利小提琴家 Foa。兰心剧院在巨鹿路，也是小型的，只能容纳约四百人，经常客满，票价不菲。更好的是交大有积极分子组织了一个“迈社”（March Club），这是音乐爱好者之家，每周有一个晚上举办音乐讲座及欣赏会，在一个大阶梯教室（可容二百多人），经常是坐得满满的。“迈社”专门请了一位上海音乐学院的杨嘉仁教授来

为我们讲解西洋古典音乐，还发讲义，是英文、五线谱的油印讲义，看来是把音乐学院的某种现成讲义拿过来做教材了，倒也干脆。因听众一般的已有一点音乐理论基础，所以他的讲解主要是曲式学和作品分析。每次讲完，配以唱片欣赏，音响不错。杨教授确是普及交响音乐的高手、教育家，他讲的曲式学不脱离音乐美学的框架，他讲作品分析总是深挖其中的思想感情，加上他的幽默风趣，故极具吸引力。讲到声乐部分，有时把他的学生女高音带来现场演唱（他弹钢琴伴奏）。如是，他为交大学生举办讲座和欣赏会持续了足有三个学期之久，我从头听到尾，获益非浅。从此我酷爱音乐，音乐成为我一生生活的一部分。这位杨嘉仁教授（是我的老师）后来在文革中被迫害致死，令人扼腕！

我尽情珍惜和享受这不可多得的交大学生生活，而对十里洋场的上海形形色色的享乐场所（酒吧、舞厅等）从不涉猎（同学们均如此）。只有一次和 S 君同去上海的“大世界”观光，曾溜到一所小剧场坐下来等待开演。人不多，空空的，忽有二位招待小姐前来搭讪，没说几句话，一边一个竟嗲声嗲气地靠到身上来，吓得我们马上落荒而逃。从此再不去大世界。

悠悠岁月，毕竟脱不开社会的动荡。反内战、反饥饿，要民主，反迫害，学生运动一浪高过一浪，而交大是上海学生运动的堡垒。到后来经常罢课，游行示威，我也参加过几次。对国民党的专制、腐败，我是反对的。我的家庭，向来只教育我们子女好好读书做人，跟政治活动从不

搭界。父亲曾自费(靠当苏州中学教员的积蓄)留学英国,在伦敦大学专攻英国文学,抗战期间回国,历任好几所大学的副教授、教授(在湖南蓝田国立师范学院与钱锺书同事)。他只醉心于他的 Shakespeare, Wordsworth, 无党无派,无权无财,际此时局维艰,勉力维持一个家庭,把我们六个子女(二男四女)都培养到大学毕业(只有我三妹读完初中即被选调到中共中央机要局工作),我想他真是有点精神的人,不容易啊。他的这点精神,无形中也影响到我。

另外一个有影响的亲人是我的姨妈,我母亲的亲妹妹,比我只大十岁。她因幼年丧母,到苏州来求学,就住在我家,(那时我刚开始读小学),所以同我家关系密切。她早年投奔革命,是老共产党员,(后来担任全国妇联国际部副部长,长驻东柏林),她的丈夫即是颇有名气的胡绳,党的理论家,历史学家。当时,她在上海(想必是中共代表团的),住静安寺路的梅龙新村,我去过好几回(后来她撤走,去香港了)。她给我几本书,叫“干部必读丛书”,有《社会发展史》《政治经济学》等。我是一个喜欢理性思考的人,不凭感情行事,不赶浪潮,送我几本书,正合我意。可是当时感到没有空来钻研这些理论,还是“好花堪折”要紧,这些书待以后再看吧。我对共产党早有接触,1945—1946 在重庆南开念高中时,姨妈家住在中共新华日报社,我去过,新华日报也常看(我们男高三二组教室里就并排贴着中央日报和新华日报)。那时宣传的只是新民主主义、论联合政府等,看了觉得很好。当然,往后

的计划经济、无产阶级专政等是一概不知的。文化方面早有预感,就是这些艺术(西方的电影、音乐、文艺等)大概是不会再有了。革命大潮已呈汹涌之势,我的二位交大同学好友,一为 D 君,一为 M 君,一位是地下党员,一位是后来被打成右派的自由主义者,把我这个自由主义倾向者夹在中间,一前一后竟影响了我的人生轨迹,这就是萍踪啊,此是后话。

转眼到了 1949 年春天,解放军正在“战上海”,上海解放在即。交大被国民党强制疏散,驻扎军队和马匹,绝大部分同学有一个临时的集体生活地点,我则住到了任家教的 Su 家,与同学们全隔绝。一天晚上,独自到兰心剧院去听工部局交响乐团的最后一场告别音乐会。这个乐团本是租界上外国人办起来的,现在到了寿终正寝的时候了,即将解散消逝。到兰心一看,听众比平时少,而且多有一种心不在焉的不安样子。然而音乐会却是非常正规而精彩的。演奏还特别投入、动情,他不想留给听众一个草率收场的印象。特意选有一个曲目是柴可夫斯基的 D 大调小提琴协奏曲,而且放在最后,小提琴独奏家又是一位俄罗斯人(即通称白俄的人)。唉,这位白俄小提琴家在这个时刻演奏他祖国的名曲,该是一种什么心情啊!他是否想到又要漂泊到何处去呢?第二乐章慢板,他拉得分外忧伤,如泣如诉。这个乐章结束时,竟有听众陆续离去,似乎不忍卒听,抑或是战争阴云已搅得心烦意乱?舞台上乐团却以极大的热情转入那原本辉煌的第三乐章快板,“白俄”是旁若无人般尽情倾泻着内心的激荡。

待到结束，他们面对已大为空荡的大厅，掌声寥寥。如此凄清的告别音乐会，我深为感动。

上海终于解放了。这一年(1949)秋季开学时，我是大四，还剩下最后一年的学业。学校的教学照常进行，还没有什么改变。我仍在 Su 家做家教。学校有了新气象，秩序井然，安定，大家专心学习，好把知识才智奉献给新社会的建设。党团均已公开，S 君原来在解放前已参加一个外围组织，现在很快入了团(那时叫新民主主义青年团)。D 君主动找我交谈，给我看小册子，后来我也申请入团。D 君做了我的介绍人，我成为团员。他给我写的鉴定意见中有一条是“觉悟有所提高，能正视自己的缺点。”是 D 君引我走上革命道路，这是我一生中的转折点。

改造世界观

参加革命后的第一个考验很快到来。1950 年元月，学校放寒假，我回南京家里过农历年。当时我还不知道，2 月 6 日这一天，国民党飞机又来轰炸上海，炸了杨树浦发电厂，造成上海大面积停电，确是一件紧迫大事，史称上海的 2.6 轰炸。农历大除夕下午，我接到 S 君从上海来信，说了 2.6 轰炸的事，说现在为了反轰炸，组织上(其实是上海市领导)紧急动员我们班的整个团支部(共有 22 名团员)立即行动起来，要架设一部防空警报雷达，参加保卫上海领空。望我立即返回上海，投入战斗。

这天晚上，我平静地同家人一起吃过年夜饭，然后向